

主编 李大纲  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文学艺术（第二辑）

The Origins of Art

# 艺术之起源

〔德〕格罗塞 著 陈易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 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文学艺术(第二辑)

The Origins of Art

# 艺术之起源

〔德〕格罗塞 著 陈 易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之起源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 
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文学艺术)

ISBN 978-7-5520-1866-0

I. ①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艺术理论—研究 IV. ①J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212号

## 艺术之起源

---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

电话总机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[sassp@sass.org.cn](mailto:sassp@sass.org.cn)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29.5

字 数: 39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5520-1866-0/J.055

定价: 138.00元(精装)

---

# 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

问题。」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「活学活用」、「急用先学」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「西学」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「救国」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黑火药大炮能打仗，这就是「天经地义」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「实用主义」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「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」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的情况来看，「民国西学」是一个比北大「启蒙西学」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「五四运动」及其启蒙大众的「西学」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大的「启蒙西学」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「民国西学」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「启蒙西学」纳入「民国西学」体系，「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」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「冲击」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「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」。反过来说，「翻译」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「会通」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「超胜」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「民国西学」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「德」格羅塞 著 陳易 譯

# 藝術之起源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出版

## 原著者序

這書是最初的嘗試——開始從未有人着手過的境界。所以，在評價方面，對於這樣性質的著述不能不望其審慎周詳。最先踏進從未有人認真探險過之新境域者，我們驟然就期待其能獲得許多而有價值的東西，那是非常之難的。只要能夠認出到此境域之路途，就該十二分的滿足了。至於這書的價值，與其說在解答方面，寧可說是在提供和鼓舞方面。不論何者，要之，在這裏，盡力簡潔地所發表的我的見解，我想，對於讀者，特別對於和我意見不同的人們，是一個小小的貢獻吧。

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，安勒士特·格羅塞

# 胡序

聖約翰說，「太初有道」（新約，約翰福音）；歌德說，「太初有行」（浮士德）。

在我們看來，歌德是比約翰有理些罷。在德國人本主義哲學家費爾巴赫（*Feuerbach*）說實有決定思維以前，這德國的偉大詩人已經在一句簡單的話裏指出精神與外物，主觀與客觀之真實關係了。是先有「行」——人類社會經濟活動，然後才有「道」——文化藝術。要證明這大詩人的意見的正確，恐怕沒有比原始時代之藝術更好的例證罷。

原始時代藝術之研究，換句話說，藝術起源之研究，不僅是一切藝術問題歸根究底的發軔點。再則我們要解決藝術上的一切問題或建設綜合的藝術科學問題，都莫如而且必須從這裏下手。

然而在研究原始時代之藝術——藝術之起源的著作中，固然有許多有價值之作，而最輝煌最重要者，恐怕要數德國布赫爾（Karl Bücher）的勞動與韻律（Arbeit und Rhythmus）芬蘭的希倫（Yrjö Hirn）教授藝術之原始（The Origin of Art）和德國格羅塞（Ernst Grosse）博士的藝術之起源（The Beginning of Art）而其材料最豐富範圍最廣汎的，又要數格羅塞之作了。

格羅塞博士生於一八六二年，是德國美術史家，以人類學底文化史底眼光，研究原始的藝術，還到日本來研究過古代之藝術。主要著作除藝術之起源（一九一二年）外，尚有論文集藝術科學之研究（Kunstwissen Schattliche Studien 一九〇〇年）等。就是藝術之起源這一部大作，也足以使格羅塞的名字，永久不朽了。

格羅塞博士的偉大功績和他這本書的價值，最重大的可說有兩點：

第一，是他提出新科學——藝術科學（Science of Art）或藝術社會學（Sociology of Art）的建設與方法的問題。藝術科學之問題最初已由比利時人米雪爾（Michiel）

提出，然而他並沒有完成這任務而終。法國杜波（Dubos）泰恩（Taine）海涅（Heinegin）孤岳（Goyan）德國赫德爾（Herder）繼之，求藝術之動因於氣候，民族，環境，時代以及智力與道德風俗習慣之中，雖然在藝術科學上作了前進一步的研究，然而他們理論之不甚正確，格羅塞已經大略批評過了。人類學者的格羅塞更重新提出這個問題，企圖綜合藝術哲學與藝術史而建立藝術科學。他除從心理學底社會學底方法外，又高唱比較人類學底方法。就如著者在自序中說的，本書的價值，與其說在他的解答，不如說還在他提出暗示的問題。

其次，是他在藝術科學之第一章——藝術之起源上，作了偉大的貢獻，在原始藝術研究上供給了豐富的材料與許多正確的論斷。從來研究藝術的人，如泰恩等，對於原始民族的藝術，好像不屑一顧似的，輕視原始藝術的簡陋。格羅塞才勇敢地提出這個問題，何以藝術的本質與生命還在重重的黑暗中呢？他以為這是因為現代藝術研究完全墨守成法，沒有充分的材料，太不注意原始民族藝術之產生，出現與發

達；殊不知一切科學的研究必須由淺而深，由簡而繁，才是正常的方法：這樣，才能在複雜的藝術現象中理出根本的動因。「藝術科學必須從原始民族之原始藝術開始」——這是人類學者的標語。於是他深刻研究狩獵民族，知道形成藝術之本質的根源，不是如泰恩等所論斷的氣候與智力狀態，而是經濟生活或生存的手段。他以浩博的學識，深銳的眼光，論證原始藝術之狀態，裝飾圖畫雕刻舞蹈詩歌音樂之起源，說明藝術之社會的機能，為生存競爭手段之藝術與原人生活的關係——總之，說明原人藝術是原人的「行」的產物，真是逸趣橫生。

如佛理采（Friche）說的，「格羅塞在所著藝術之起源中，給我們以真實藝術社會學之典型」。豐富的例證，透闢的眼光，光彩的敘述，輝煌的論證，合成這興味津津的偉大之作。

然而，格羅塞之作，就毫無什麼缺點麼？不，一本名著固然要知道牠的價值，同時也要理解牠的短處，所以我敢指出重要的二三點，供閱者之注意。第一，他僅將



他正確的觀點，限於原始民族之藝術——而且並不是石器時代之狩獵人，僅是現在尚存的狩獵民族；泰恩不能以自己的觀點說明自己研究以外的藝術，格羅塞移到文明民族之藝術亦不能填泰恩留下的餘白；據他的意思，原人之藝術是原人生活之產物，而高級藝術之產物，只是藝術家個人感興之創造。其次，他關於原始藝術發生之程序，以為人體裝飾最先，其後才有表現藝術——雕刻圖畫，以及舞蹈詩歌，而後才是音樂，切利鯨身在用具製造及造型藝術之先，恰與布赫爾陷於同樣不正確的結論，而布赫爾另一正確的結論，謂「勞動，音樂與詩歌在最初是融合為三位一體（Trinity）而基本要素為勞動……詩歌之原始，在勞動過程之中」。（勞動與韻律），應該比格羅塞之見，更為健全。第三，格氏的說明，有時不免小有自相矛盾的，如謂布霞人（Bushman）和澳洲土人的繪畫「實際上都表示某種宗教的象徵的東西，是無疑義的事實」，而一面又說「現代原始民族的畫是由純粹的創作愁而發生」。此外，也還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地方。

然而，這些地方比較起他的偉大的功績來，不過是白璧之微瑕罷了。世界上原無盡美盡善的書籍哩。此處略爲說一點的，不過是希望讀者在讀任何名著之前也要有一種批評的眼光，知其所短也就是知其所長，這與吹毛求疵是不同的。自然，像這可愛的書，對於作者總只敬服感謝而已。

此書是研究藝術之起源的有數名作，近日言原始藝術者，殆不能忽略此書，懷列漢諾夫與佛理采書中亦引甚多。此書雖出版於三十七年以前，但我前年始得見其英日譯本，讀之快甚，且覺其興味盎然，常動翻譯之念，而以他事牽纏，未遑執筆。現適逢老友陳易之君已費兩個月之努力，將此書譯出，介紹於中國讀者之前，遠道聞之，無任快然，聊於忙中略誌數語。至易之君的譯文，爲讀者所共覩，自毋庸我個人之詞費。像這樣有光輝有價值的著作，介紹於國人之前，在藝術理論淺薄之中國，真是一件非常可慶幸的事。

最後，爲有志研究原始藝術及藝術起源的讀者起見，除格氏此著外，舉出下列幾